

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决定^{*}

魏后凯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系统的数据和计量模型方法,探讨了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决定。分析结果表明,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主要受市场规模大小和集聚经济效果的影响,并具有向高工资地区集中的趋向;而韩国在华投资的分布则主要决定于地理和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从省级地域单元来看,地区平均税负水平的高低对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制造业 区位选择

一、外商制造业投资的区域分布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香港、美国和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然而,自90年代以来,随着中韩恢复邦交,新加坡和台商投资的增加,以及欧美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不断抢占中国国内市场。由此出现了外商投资来源地多元化的趋势。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仍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澳门等华人资本。这些华人资本比较强调血缘关系和历史上的经济文化联系,在投资区位选择上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地区。近年来,随着东南沿海生产成本的上涨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港澳地区对内地投资已开始出现分散化的趋势,逐步由东南沿海向北部、中部和大城市地区转移扩散(贺灿飞、陈颖,1997)。

除了华人资本之外,目前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选择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7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瑞典)来进行研究。1985年,来自这10个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约占全国的42.1%,近年来虽然该比重有所下降,但1998年仍占28.4%。这里之所以把欧洲7国看成一个整体,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地理上相互接近,经济文化联系比较密切,在投资区位选择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相比,虽然欧美日韩在华投资也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但他们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更加集中在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中部沿海地区,以及以环渤海湾为核心的北部沿海地区。表1列出了1995年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的地区分布。从表中可以看出,欧洲7国在华的制造业企业较少,主要集中在中部沿海地区,其次是北部沿海地区。欧洲在华制造业投资高度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与欧洲一些大型跨国公司首先进入上海等地并取得较大成功有关。一般说来,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率先进入,将会促使其他相关企业相应跟进,形成像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专题报告。该项目批号为7977097。

“滚雪球”似的集聚效应。

美国和日本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在中国大陆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其在华制造业企业相对较多,分布也比较广泛。不同于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在华制造业投资相对均衡地集中在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这两个地区所占的比重大体旗鼓相当。然而,考虑到中部沿海仅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三个省市,人口和土地面积较小,因此,美日在中部沿海地区的投资强度要远高于北部沿海地区。

韩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相对较晚,在华制造业投资规模也较小。但自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韩国企业来华投资迅猛增长,目前已成为中国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国,仅排在美国、日本和新加坡之后(港澳台地区不计)。由于受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影响,目前韩国在华制造业投资高度集中在环渤海湾地区。如果加上临近的吉林和黑龙江,韩国在中国北部沿海及东北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数达到882个,占韩国在华制造业企业数的84.7%,从业人员占81.2%,外国投资额占76.2%。

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日本和韩国,其在南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投资比重都不大,而且主要集中在广东和福建两地,而广西和海南则很少。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这些国家在华制造业投资规模更小。即使是为数不多的几家制造业企业,也主要集中在四川(含重庆)和陕西等地。欧洲7国在西藏、甘肃、青海,美国在青海,日本在西藏、甘肃、青海,以及韩国在山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都还没有制造业企业。

表1 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的地区分布

国家	项目	总计	地区分布(%)				
			北部沿海	中部沿海	南部沿海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欧洲 7国	企业数(个)	279	410	90	96	36	
	所占比重(%)	100	30.6	45.0	9.9	10.5	4.0
	从业人员(万人)	22.66	25.0	46.2	11.6	13.7	3.5
	外国投资额(亿元)	158.03	25.8	43.1	14.1	14.2	2.9
	产品出口(亿元)	92.44	21.8	46.3	27.2	4.0	0.7
美国	企业数(个)	2434	843	974	219	271	127
	所占比重(%)	100	34.6	40.0	9.0	11.1	5.2
	从业人员(万人)	46.51	35.1	34.9	11.9	12.0	6.1
	外国投资额(亿元)	181.04	31.8	31.9	22.9	8.7	4.7
	产品出口(亿元)	248.25	26.0	41.8	27.6	3.5	1.2
日本	企业数(个)	2742	1013	1136	334	196	63
	所占比重(%)	100	36.9	41.4	12.2	7.1	2.3
	从业人员(万人)	52.91	33.9	37.8	17.7	8.4	2.3
	外国投资额(亿元)	276.11	40.7	34.2	18.5	3.8	2.8
	产品出口(亿元)	670.96	34.8	28.4	35.0	1.3	0.5
韩国	企业数(个)	1041	735	92	46	162	6
	所占比重(%)	100	70.6	8.8	4.4	15.6	0.6
	从业人员(万人)	24.20	73.5	10.5	7.0	8.8	0.2
	外国投资额(亿元)	64.52	69.0	11.3	8.2	11.3	0.2
	产品出口(亿元)	218.89	65.6	12.5	15.9	6.0	0

注:北部沿海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中部沿海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包括广东、福建、广西和海南。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全国三资工业企业数据库光盘》汇总计算。下表同。

从投资战略来看, 欧美国家在华制造业投资更多地看重中国巨大的国内潜在市场, 开发和占领当地市场是他们来华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相反, 日本和韩国在华制造业投资更多地看重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 寻找最低生产成本区位, 向本国和第三国出口。1995年, 美国在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26.7%, 欧洲 7 国为 14.1%, 而日本为 59.8%, 韩国为 82.5%。事实上, 由于中国离日本和韩国较近, 随着日韩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成本的上升, 逐步把国内一些制造业生产环节转移扩散到中国大陆地区, 将有利于提高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日本和韩国在华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主要是针对本国的出口。1995 年, 日本在华制造业出口构成中, 对日本的出口占 70.7%, 香港占 21.5%, 美国占 4.3%; 而韩国在华制造业出口构成中, 对韩国的出口占 66.4%, 美国占 14.1%, 日本占 10.0%。这说明, 日本和韩国所以在华进行制造业投资, 很大程度上是把大陆看成满足本国市场需要的最低成本生产区位和生产基地。如果这种投资战略不发生变化的话, 要想推动日本和韩国资本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推进将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从扩大出口的角度看, 沿海地区至今仍然是比较理想的生产区位。

表 2 日本和韩国在华制造业企业的出口(1995)

国别	日本			韩国	
	金额(亿元)	比重(%)		金额(亿元)	比重(%)
总计	633.76	100	总计	183.45	100
日本	447.96	70.7	韩国	121.72	66.4
香港	136.18	21.5	美国	25.87	14.1
美国	27.26	4.3	日本	18.38	10.0
英国	4.54	0.7	香港	3.1	1.7
新加坡	4.34	0.7	德国	2.47	1.3
韩国	2.82	0.4	俄罗斯	1.18	0.6
其他	10.66	1.7	其他	10.73	5.8

资料来源同表 1。

二、理论假设、模型与数据

1. 对现有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 国家之间的经济界限正在日趋模糊, 跨越国界的国际投资和多边合作迅猛发展。然而, 在跨国投资战略决策中, 母公司的国籍差别仍对其海外投资区位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按照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跨国公司大都拥有一些独特的产权优势。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这种产权优势所带来的利益, 他们往往把其具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复制、转移扩散到其他生产区位。由于不同国家在不同行业和领域具有不同的优势, 因此不同国家跨国公司在进入一个市场后, 其在区位选择上所考虑的因素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当然, 除了这种差异性之外, 各国跨国公司在投资区位选择上也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承认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存在, 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条件。

跨国公司在海外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决策过程, 不仅要考虑生产成本方面的因素, 而且要考虑市场需求以及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因此, 对外商制造业投资来说, 基础设施、工业配套程度、市场规模、制造业工资率、地方刺激政策等, 都是影响其区位决策的十分重要的因素。Hill 和 Munday (1992, 1994) 在研究英国案例时曾经假设, 外商直接投

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其在生产成本最小化和接近消费者及要素市场之间的抉择。通过研究他们发现,外商在英国投资区位的选择主要是考虑生产成本方面的因素。这与强调成本最小化的传统区位理论是基本一致的(Hill & Munday, 1992)。然而,外商在法国制造业的投资区位选择中,生产成本最小化因素则不太重要(Hill & Munday, 1995)。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不单纯是考虑成本最小化方面的因素,而是受诸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Yamawaki(1993)对日本跨国公司在欧洲制造业投资区位的研究表明,日本直接投资一般倾向于选择在劳动力成本较低,R&D能力较强,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由此他认为日本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取决于成本最小化方面的考虑以及那些决定东道国比较优势的因素。Kravis和Lipsey(1982)也发现,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比较倾向于接近原材料和半成品容易获得,东道国市场规模较大的地方。

Friedman、Gerłowski和Silberman(1992)还研究了日本和欧洲公司对外制造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发现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条件方面,如日本制造业公司在美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其在统计上有重要意义的决定因素包括制造业工资(?)、工会化程度(+)和生产率(+),而这些因素对欧洲制造业公司没有统计上的意义。对日本和欧洲投资者都具有统计意义的因素包括:需求(+)、接近港口(+)、州和地方税率(?)、政府促进支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迅猛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问题已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在国外,大量有关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文献不断涌现;在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综合性的,没有考虑到不同产业部门和投资来源国之间的差别。到目前,无论是在中文文献还是在英文文献中,学术界对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对不同投资来源国(地区)在华投资区位的研究,也仅仅局限于港澳地区在内地的投资区位选择方面。

2. 理论假设

外商制造业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不仅在不同投资来源国之间具有差异,而且在不同受资国(东道国)之间也具有差异。根据前面分析,我们可以假定,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的选择,主要受生产成本、市场规模大小、集聚经济状况、企业税负水平以及经济文化联系等几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1) 生产成本因素。在影响海外投资区位决策的各种生产成本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工资成本。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工资成本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据Kravis和Lipsey(1982)的研究,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虽然其估计的系数在统计上并不太显著。Yamawaki(1993)则发现,劳动力成本对日本跨国公司生产区位的选择有着更加强烈的负的影响,即倾向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区位。但Swedenborg(1979)对瑞典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瑞典直接投资倾向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Dunning(1980)对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也发现,受资国生产在海外市场的份额越高,工资率一般也相对较高。Mason和Howell(1992)则发现日本公司一般选择美国工资较高的地区去投资。为了考察劳动力工资对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我们选择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作为主要指标,同时选择效率工资水平作为替代指标来进行分析。效率工资,是指每创造一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工资额。从理论上讲,对大多数外国投资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

括号中的符号表示其影响的方向,“+”表示有正的影响,“-”表示有负的影响。

名义上的工资率,而是真实的效率工资。因此,我们期望效率工资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有着负的影响,即效率工资水平越高,外商制造业投资流入量越小。

(2) 市场规模大小。跨国公司在选择制造业子公司区位时,一般把市场规模的大小看成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跨国公司把制造业工厂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将可以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并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据Woodward(1992)对日本跨国公司在美国制造业投资的研究表明,一个州的市场规模以及相对于其他州市场的位置,与该州的外商直接投资成正相关。Swedenborg(1979)、Dunning(1980)的研究也表明,跨国公司活动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假如上述结论在中国同样具有适应性的话,各地区市场规模大小将对外商在华制造业区位的选择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可以用其经济总量规模如GDP来进行衡量。GDP总量规模越大,不仅反映了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而且也反映了地区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工业和第三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由此可以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

(3) 集聚经济状况。大量的研究表明,集聚经济对外资制造业工厂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正的影响(Head, Ries and Swenson, 1995)。这种集聚经济不仅体现在城市规模经济效益方面,而且也体现在行业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大量的相关企业在地域上相互集中在一起,将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扩大生产和消费需求,并有利于相互竞争和协作,提高管理和办事效能。据O'Hallachán和Reid(1992)研究,加拿大公司在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地区分布与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地区分布是一致的,而德国、日本和英国公司在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分布则高度集中在最大的几个制造业州。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也高度集中在中国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几个制造业基础较好的省市。这说明,外商制造业投资倾向于选择在基础设施和工业配套程度较好的地区,以便获取集聚经济效益。对于集聚规模经济,我们将选择各地区的城市化率来进行衡量。事实上,GDP总量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区的集聚经济状况。

(4) 企业税负水平。一般说来,较高的企业税率将会阻碍外商制造业直接投资。为了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以及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保税区,以便能创造一个适宜于外商投资的外部小环境。在以往的分析中,一般都选择虚拟变量来进行研究,如鲁明泓(1997)将享有特殊优惠政策的广东、福建和海南设计为1,其他地区为0。这里,我们采用工业应交税金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指标,来综合衡量一个地区的工业平均税负水平。根据理论假设,企业税负水平将对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选择有着负的影响,即企业平均税负水平越低,外商制造业投资流入量越大。

(5) 经济文化联系。正如港澳台商与广东、福建有着天然的地理和经济文化联系,在华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一样,韩国与中国环渤海湾地区和东北地区,在地理和经济文化上也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种地理和经济文化联系将有利于韩国制造业投资的流入。为此,我们将设置虚拟变量来反映这种联系和交往。

3. 模型设计与数据

根据上面的理论分析和假设,我们可以建立如下数学模型:

$$PFMI = \alpha_0 + \alpha_1 \ln WWA G + \alpha_2 \ln GDP + \alpha_3 URBAN + \alpha_4 TAX + \alpha_5 LOC + u_i \quad (1)$$

$$\text{或者: } PFMI = \beta_0 + \beta_1 \ln WAGE + \beta_2 \ln GDP + \beta_3 URBAN + \beta_4 TAX + \beta_5 LOC + u_i \quad (2)$$

式中: α_0 、 β_0 为截距, α_i 和 β_i ($i=1, 2, \dots, 5$)分别为各解释变量对PFMI变化的弹性系数, u_i 为估计误差。各变量的定义及其可能的影响方向见表3。

表 3

各变量的定义及其可能的影响方向(1995)

变量	定义	影响
PFM I	外商在华制造业企业外资金额的地区分布(%)	
WAGE	工业部门每创造一元增加值所支付的工资和福利费用(元)	-
WWAG	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元)	?
GDP	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
URBAN	各地区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TAX	各地区工业应交税金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
LOC	反映韩国与中国各地区地理和经济文化联系的虚拟变量	+

本文所分析的数据, PFM I WAGE 和 TAX 均来自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GDP 和 WWAG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 URBAN 则取自魏后凯主编的《21 世纪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对于虚拟变量 LOC, 我们将环渤海湾和东北地区的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设置为 1, 其他地区为 0。

三、分析结果及主要发现

由于西藏的情况十分特殊, 对外交通非常不便, 基本上不适合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因此, 在本文的模型分析中, 不包括西藏自治区。重庆市由于建立直辖市比较晚, 其数据仍包括在四川省之中。这样, 本文分析的地区范围包括除西藏以外的 2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表 4 列出了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PFM L E8、PFM L U S、PFM L J A P、PFM L K O R 分别代表欧洲 8 国、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地区分布。从表中可以看出, 欧洲 8 国、美国和日本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地区分布型式十分相似, 三者之间呈现出十分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这说明, 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是相互影响的, 其区位选择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相反, 韩国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地区分布则与欧美日截然不同, 具有较大的特殊性。

表 4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PFM L E8	PFM L U S	PFM L J A P	PFM L K O R	lnGDP	lnWWAG	URBAN	TAX	WAGE	LOC
PFM L E8	1.000									
PFM L U S	0.873***	1.000								
PFM L J A P	0.620***	0.764***	1.000							
PFM L K O R	0.206	0.273	0.386**	1.000						
lnGDP	0.373**	0.475***	0.497***	0.370**	1.000					
lnWWAG	0.705***	0.809***	0.523***	0.100	0.181	1.000				
URBAN	0.627***	0.579***	0.478***	0.213	0.025	0.391**	1.000			
TAX	-0.187	-0.278	-0.247	-0.182	-0.238	-0.069	-0.192	1.000		
WAGE	-0.244	-0.284	-0.166	-0.339*	-0.400**	-0.268	-0.145	-0.222	1.000	
LOC	0.156	0.153	0.244	0.552***	0.198	-0.057	0.577***	-0.095	-0.258	1.000

注: ***, **,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双侧检验)。

而且, 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分布与市场规模、制造业平均工资和城市化率密切相关, 而韩国投资则更多地考虑地理和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这可能与韩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较晚有关。在所分析的各自变量之间, 除 LOC 和 URBAN 外, 其相关系数都不是太大,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为了综合分析各因素对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 我们采用 OLS (Ordinary Least Square) 方法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表 5 是回归分析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 除韩国外,

其他模型调整后的 R^2 都在0.44以上,F值都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说明解释模型在统计上是可靠的,大体可以解释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分布44%以上的差异。即使是韩国的解释模型,调整后的 R^2 也为0.30,F值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该模型可以解释韩国在华制造业投资地区分布30%的差异。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lnGDP对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分布有着十分显著的的正的影响。这说明,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更多地考虑当地的市场规模、经济发展基础和工业配套程度。正因为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北部沿海一些制造业基础比较好的地区。据分析结果表明,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地区分布与中国现有工业的地区分布高度吻合,其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566、0.682和0.712。

(2)与前面的理论假设十分一致,URBAN对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同样有着十分显著的的正的影响。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流入量就越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地区基础设施和集聚经济状况,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向城镇密集地区集中,将可以享受较为完善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各种服务,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事实上,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不仅存在着向大中城市集中,而且也存在着向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集聚的倾向。这三个地区人口城镇稠密,工农业生产发达,劳动力素质较高,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区所在。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首先向这些地区集中,这是理所当然的。

表5 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的决定

国家或地区	欧洲		美国		日本	韩国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1
常数	- 122.11*** (4.709)	- 20.32 (- 1.459)	- 131.998*** (- 8.475)	- 15.666 (- 1.329)	- 88.79** (- 2.677)	- 66.011 (- 1.214)
lnGDP	1.73** (2.383)	2.274** (2.144)	1.851*** (4.244)	2.335** (2.599)	2.685*** (2.891)	1.490 (0.988)
lnWWAG	12.71*** (4.043)		14.203*** (7.523)		8.266* (2.056)	7.523 (1.099)
WAGE		- 0.684 (- 0.048)		- 4.185 (- 0.344)		
URBAN	0.143** (3.544)	0.207*** (4.187)	0.0905*** (3.734)	0.159*** (3.804)	0.113** (2.181)	- 0.132 (- 1.228)
TAX	- 0.0057 (- 0.56)	0.0134 (0.094)	- 0.0746 (- 1.229)	0.0667 (- 0.553)	- 0.0558 (- 0.431)	- 0.139 (- 0.701)
LOC						12.237*** (3.099)
F值	15.075	6.537	38.94	7.449	7.212	3.395
F显著性	0.000	0.001	0.000	0.000	0.001	0.019
R^2	0.715	0.521	0.866	0.554	0.546	0.425
调整后的 R^2	0.668	0.442	0.844	0.480	0.470	0.300
标准误差	3.3159	4.2992	1.9916	3.6405	4.2413	6.4740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t检验。***、**、*分别表示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侧检验)。

(3)制造业工资水平(lnWWAG)对欧美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有着十分显著的的正的影响。这说明,欧美在华制造业投资主要是流向一些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这一结论与

Swedenborg (1979)、Dunning (1980)、Mason 和 Howell (1992) 等人的实证分析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在对日本的解释模型中, $\ln W W A G$ 对 $P F M L J A P$ 的影响虽然为正(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23), 但它只在 10%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然而, 出乎意料的是, 作为反映工业效率工资水平的重要指标, $W A G E$ 对欧美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虽然为负, 但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显然, 欧美日企业不会有意将制造业企业选择在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 而不考虑到其效率工资水平状况。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 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中外工资的巨大差别, 外资的进入将导致当地工资水平的上涨。二是由于基础设施和工业配套条件较好, 外商从产业集聚中所获得的利益要超过高工资所带来的损失。三是由于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效能的提高, 沿海地区尽管工资水平较高, 但效率工资水平并不算太高, 甚至要低于中西部地区。1995 年, 东部地区工业部门每创造 1 元增加值所支付的工资和福利费用为 0.323 元,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 0.342 元和 0.350 元, 分别比东部地区高 5.9% 和 8.4%。

(4)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 $T A X$ 对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由于 $T A X$ 反映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企业的平均税负情况, 因此, 至少从省级地域单元来看, 目前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地区总体税负水平的降低能够导致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增加。然而, 从三大地带的情况来看, 中西部地区工业的平均税负水平要远高于东部地区, 这与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地区分布是吻合的。1995 年, 东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为 23.91%,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为 27.59% 和 33.66%, 分别比东部地区高 15.4% 和 40.8%。

(5) 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而韩国投资则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ln G D P$ 、 $\ln W W A G$ 和 $U R B A N$ 对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分布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 而对韩国在华投资则没有影响。与欧美日在华投资不同, 韩国在华制造业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和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的支配, 在地区分布上则高度集中在环渤海湾和东北地区。这与 80 年代初期港澳资本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形是十分相似的。

四、若干政策性结论

(1) 集聚经济是影响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选择至关重要的因素。中西部地区要想吸引更多的外商制造业投资, 就必须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当地工业的配套能力, 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尤其是, 要充分发挥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特大城市的优势, 加强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协作与配套, 逐步形成一些有利于发挥集聚规模效益的“半小时经济圈”, 使之成为外商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制造业投资的生产基地。在近期内, 设想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向中西部广大腹地大规模推进, 这是不现实的。

(2) 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比较强调对本国的出口, 而欧美投资则比较看重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拓。从扩大出口的角度看, 沿海地区自然是外商在华建立制造业生产基地的比较理想的区位。中西部地区要想吸引这类投资, 就必须打通与沿海主要港口之间的快速通道, 疏通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从开拓国内市场的角度看, 交通方便的中心城市尤其是大区经济中心和省会(首府)城市, 都是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比较理想的生产区位。中西部地区要想吸引这类外商投资, 就必须采取以市场换资金、换技术的战略, 对外商制造业投资不能要求过高的出口比例。

(3) 尽管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工资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但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似乎对低工资并不太敏感。事实上, 低工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如果工业生产效率较低, 这种

低工资成本的优势将会被完全抵消。目前,中西部地区的效率工资水平平均要比东部地区低5%~9%。如果今后中西部地区不在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方面下较大功夫,以逐步降低工业效率工资水平的话,那么要扩大招商引资尤其是对欧美国家的招商引资,将会面临很大困难。

(4) 尽管从统计上我们并没有发现高税负将阻碍外商制造业投资的有力证据,但目前中西部地区较高的工业平均税负水平,无疑将不利于外商制造业投资的进入。中西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较高,可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是由于中西部地方政府财政乏力,往往存在乱摊派、交过头税的现象,而沿海地区大多实行“放水养鱼”的政策;二是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惠远不如沿海地区,税费较低的经济特区和各种开发区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三是中西部一些具有优势的产业如烟酒等一般税率较高,因此,对地方政府来说,要坚决制止乱摊派,对各种税费要及时进行清理;对中央政府来说,要在税收减免方面对中西部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

参考文献

1. Dunning, John H. 1980 "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ome empirical tes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1: 9~ 31.
2. Friedman, Joseph, Daniel A. Gerlowski and Jonathan Silbeman. 1992 "What attracts foreig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vidence from branch plant lo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2 (November): 403~ 418
3. Head, Keith, John Ries and Deborah Swenson. 1995 "Agglomeration benefits and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8(May): 223~ 247.
4. Hill, S. and M. Munday. 1992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K." *Regional Studies* 26: 535~ 544
5. Hill, S. and M. Munday. 1994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Inward Investment in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6. Hill, S. and M. Munday. 1995 "Foreig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France and the U.K.: a regional analysis of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86(4): 311~ 327.
7. Kravis, Irving B. and Robert E. Lipsey. 1982 "The location of overseas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for exports by U.S. multinational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 1~ 23
8. Mason, T. David and Frank M. Howell. 1992 "Japa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f trend and site selection behavi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tlanta, March 30~ April 4
9. ÓUallacháin, Brendan and Neil Reid. 1992 "Source country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4(3): 272~ 285
10. Swedenborg, Brigitta. 1979. *The Multinational Operations of Swedish Firms: An Analysis of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Stockholm: The Industri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11. Woodward, Douglas P. 1992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start-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8(January): 690~ 708
12. Yamawaki, Hideki. 1993 "Location decisions of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in Europe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Kirsty S. Hughes, ed.,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贺灿飞、陈颖:《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载《地理科学》第17卷第3期。
14. 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15. 魏后凯主编:《21世纪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市 100836)

(责任编辑:王燕梅)